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十字架上的女性基督：析五四女性文學中的耶穌形象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UO, Xiaoxia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2 02:57:0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80

十字架上的女性基督： 析五四女性文学中的耶稣形象

郭 晓 霞

内容提要：五四女作家从民族境遇和自我体验出发理解并接受耶稣形象，一方面将耶稣看作一个有着伟大人格的人，另一方面看到了男性耶稣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品质，如自我牺牲、受难、宽恕、博爱等，进而在作品中描写了一系列女性基督形象。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以耶稣的男女平等思想和女性基督形象对抗父权等级思想，并最大限度地肯定女性的传统价值。

关键词：民族境遇；女性经验；女性基督；父权等级制思想；女性意识

Female Christ on the Cross: Analysis of the Jesus Images in May 4th Female Literature

Guo Xiaoxia

Abstract: May 4th female writers understand and accept Jesus under the national context with conscious of their own female experiences. On the one hand, they think him as a

great man with strong persona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women writers find in him some similar qualities, such as self-sacrifice, suffering, forgiveness, philanthropism etc. Because of this,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consider him as a female. Therefore, they create many female Christ in their works. With Jesus' 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sexes and the female Christ images created, they hope to show their resistance to traditional hierarchical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also exhibit a strong confirmation of women's traditional values.

Key words: national context; female experience; female Christ; hierarchical patriarchal ideology; female consciousness

耶稣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备受关注,且影响深远。与这个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五四女作家从自身经验出发,采取了“拿来主义”策略,有所取舍地接受耶稣形象,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自我经验中的耶稣形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这一课题的众多研究论著中,仅有王珊、马红英在《“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论基督精神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形象类型》^①一文中,笼统地将五四女作家笔下的诸多形象与基督精神联系起来,而对五四女性文学中的耶稣形象仍然缺乏具体、细致、深入和整体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考察中国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对耶稣形象的认识及其作品中所刻画的耶稣形象,目的在于探讨性别、族群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所显示出的意义。

① 王珊、马红英:《“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论基督精神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形象类型》,《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

一、五四女作家对耶稣形象之认识

欲探讨五四女性文学中的耶稣形象,必先探讨五四女作家对耶稣形象之认识。在基督教义中耶稣具有神、人两种属性,但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而言,科学和理性却使耶稣的神性——如童贞女马利亚感受圣灵怀孕所生的奇特身世、以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等神迹,及其死而复活等——极易破灭。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盲目的、超理性的”灵异学说进行了批判,^①五四女作家也从科学立场认识耶稣,如庐隐认为:“其实一部圣经,不过是文学家的一种想象,用来发挥耶稣的伟大精神的,何尝不是史实的记载?”^②即使冰心、苏雪林这类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也没有完全认可耶稣的神性,而是感动于耶稣人性中伟大的人格。冰心不但把耶稣看成一个完全的人,还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私生子。她在《我入了贝满中斋》一文中说:“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③冰心的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知,耶稣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经历了一个去神性化而实现世俗化并最终“圣

-
- ① 如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论述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钱玄同只相信耶稣是个木匠的儿子,绝对不相信那“圣灵感孕”的话。陈独秀的《基督教和中国人》初见于《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载《生命》2卷7期。参见林茂生、杨淑娟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483页。
- ② 庐隐:《庐隐自传·其他》,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603页。
- ③ 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卓如编:《冰心全集》(7),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第471页。

人”化的过程。中国人自古崇圣,对鬼神敬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如果说基督教文化将超越性人格解释为“神”,那么中国儒家文化则将超越性人格理解为“圣”。中国知识分子受“前见”文化——儒家“圣人”文化——之影响,自然而然地会用中国圣贤的道德比附、诠释耶稣的人格。^①五四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也受“前见”文化影响,并从自身经验出发接受耶稣的伟大人格。

五四女作家主要从世俗角度看待和接受耶稣背负十字架所体现的自我牺牲精神,以中国母亲和女性的受苦受难、自我牺牲精神比附耶稣崇高的牺牲精神。如苏雪林在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以杜醒秋自称,将自己居于屈从地位、受苦受难的母亲经历和耶稣的屈从、受难经历联系起来,从受难的耶稣身上看到了母亲受难的意义,最终舍弃自己的爱情跟从受难的母亲。在醒秋看来,母亲虽不是宗教家,但其德性之醇厚和宗教家并无差别,其牺牲克己之精神更在修女乃至耶稣身上得到了互证,联想到耶稣为爱人而钉十字架,而信徒爱人是模仿耶稣的榜样、是为耶稣伟大的人格所感化,以致感叹“母亲真是一位天生的圣徒”。^②

总之,五四女作家从民族境遇和自我体验出发,舍弃了基督教神学中耶稣的神性因素,仅将耶稣当作一个历史性人物看待,而其贫贱低下的出身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耶稣与中国女作家的距离,使她们依照女性经验理解和接受耶稣牺牲、宽恕和博爱的伟大人格,并在作品中描摹她们自我经验中的耶稣。

① 如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于1930年代撰写的《耶稣传》就以中国圣贤比附耶稣,以“圣”解“神”。参见赵紫宸:《耶稣传》,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则将耶稣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归结为三点:“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参见林茂生、杨淑娟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83页。显然,这样的诠释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深层心理中的传统思想积淀及其心理架构上的某种共同性。

② 苏雪林:《棘心》,沈晖编:《苏雪林文集》(1),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第90页。

二、五四女性文学中女性基督之形象

具有男性身份的耶稣之所以能被五四女作家接受,除了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耶稣具有尊重妇女的态度和男女平等的思想。

西方女性主义者在用非传统眼光细读《新约》尤其是福音书的过程中发现,耶稣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父权制的藩篱:与名声不好的女人谈话;拣选一个女人宣告其复活的消息;打破禁忌治愈患血漏症的女人;接受一个可能是妓女的女人为他涂抹香膏;宽恕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这一系列叙事表明,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耶稣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俨然挑战了当时的性别等级制度,体现出反抗世俗、主张平等的精神。耶稣明确宣告了女人得解放的信息:“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加3:28-29)因此,耶稣成为跨越种族藩篱的兼顾外邦人、边缘社群、被拒绝被压迫社群的基督,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精神。在耶稣身上,女性主义者体验到了正义、自由、完全的力量,看到了女性解放的未来图景。

当一些激进的西方女性学者因为耶稣具有不可更改的男性身份而质疑“一个男人能否拯救女人”时,中国五四女作家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妇女却毫不迟疑地接受或跟从耶稣这个男人。在她们看来,耶稣的性别不是问题,因为耶稣尊重妇女并宣告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信息。对中国妇女而言,男性本来就是她们解放的启蒙者、拯救者,而耶稣又是她们人生经验中唯一一个用人的尊严爱她们、尊重她们的异域神,因此,具有妇女解放思想

的耶稣不会因为男性身份而被中国妇女拒绝。女性主义圣经学者萝特的观点可以说明中国妇女对基督性别的看法,萝特认为,救赎的基督和被救赎的妇女的关系,不会形成最终的神学性别象征,基督不一定必须是男性,或那被救赎的不只是女性,而是包括新人性——男性和女性。^①

在五四女作家看来,耶稣实质上传达了先知弥赛亚的传统。他是一个保护弱者、判断正义的谦卑形象,是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仆人性的领导者典范。他与弱者、被压迫者的关系是互相关爱,而不是专横。从这层意义看,耶稣是一个被压迫者的解放者,给弱者、边缘者带来了福音。耶稣作为一个解放者,宣告了对阶层关系的断绝和解除,要结束那些强调特权和产生阶级分离的社会。所以,“从神学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耶稣的男性位格最终没有什么重要性。它在父权的社会构架中有其社会的象征地位。但在这种情况里,耶稣作为基督,作为那种传达神圣话语的代表,展示了对父权的倒空,宣告了新人性是藉着放弃特权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开始与低下阶层对话。在类似的情况下,社会和宗教所拒绝的女性回应他,就有了社会的象征意义——一个反对父权专制的偶像崇拜的见证”。^②五四女作家不但从自己的民族经验认识耶稣,还从自身的女性经验感受耶稣,在耶稣身上体验到中国妇女具有的苦难、坚韧、宽恕、仁爱,从耶稣受难意义中看到了中国妇女未来的希望。从这层意义看,耶稣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女性的解放者。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女性将自己的女性体验和耶稣联系起来时,实质上是将自己基督化,而当女性被基督化时,基督在女性思想中也就女性化了。尽管五四女作家如同毫不质疑耶稣的人性一样毫不质疑耶稣的男性身份,由于她们及其所经验的中国

① 萝特:《性别主义与言说上帝》,杨克勤、梁淑贞译,香港:道风书社,2004,第153页。

② 同上。

女性和耶稣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更愿意从自我经验出发感受耶稣、描绘耶稣。由此，五四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宽恕精神、博爱精神的形象类型，被学者王珊、马红英归纳为拯救者、宽恕者和受难者形象。^①在这些具有基督精神的形象中，以爱、牺牲、宽恕、谦让、坚韧等品质为核心的女性精神等同于基督精神，因此无论是拯救者、宽恕者还是受难者，无不体现了作者的性别体验，成为女性化的基督体验。

冰心的小说《我的学生》中的S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基督。小说采用了弗莱原型批评理论所谓的U型结构：欢乐的开始，受难，爱的实现。故事开篇时主人公S是一个单纯、活泼、好奇、精力充沛的女孩子，三年后这个“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即使婚后仍将自己的家收拾成“澳洲中国大使馆”的贵妇人毅然离开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云南山区支援后方建设。这正是对耶稣舍弃天堂福乐和上帝之子的尊荣而降世为人类担当罪恶的效法。^②凭借女性的坚毅，她在艰苦的云南山区竟然建立起人间乐园：

菜园里红的是辣椒、西红柿，绿的是豆子，黄的是黄瓜，紫的是茄子，周围是一片一片的花畦，阳光下光艳夺目，蜂喧蝶闹。菜园里的后面，简直就像个动物园！十几只意大利的大白鸡，在沙地上吃食，三只黑羊，两只狼犬……还有小孩子养的松鼠和白兔……^③

S的菜园对应圣经中的伊甸园。在文学中，田园的文学类型

① 王珊、马红英：《“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论基督精神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形象类型》，《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

② 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

③ 冰心：《我的学生》，卓如编：《冰心全集》（3），第270页。

“通常为一片宜人的郁郁葱葱的景色,到处是林间绿地、荫蔽的山谷、潺潺的溪水、明亮的月光,以及其他与女性或母性有密切联系的意象”。^①不仅如此,冰心在小说中还采用色彩来展现主人公的女性意识。红、绿、黄是光谱学中的三原色,代表了所有的颜色,紫色是象征虔诚的色相,美丽而神秘,具有强烈的女性化性格,表现着孤独与献身。这四种颜色出现在S的“伊甸园”里,表明她热爱生活、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是所有女性的化身,紫色则预示了她为他人献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S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救世主身份,而完全融入到生活中,对自己的艰苦生活不曾有丝毫抱怨,“真好玩”的处世态度体现出中国女性坚韧、达观的精神。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流血而死,最终她为救人性命,输血过多而死,完成了以自身拯救世人的使命,回归上帝身旁,爱心得到实现。

与S女士遥相呼应的是庐隐《余泪》中的修女白教师。这是一位有着“纯洁温蔼的眼波”和“时现笑容的嘴唇”的“圣母那般纯洁”的修女,为人类的互相残杀而深感羞耻,决意上前线充当上帝的使者,“用基督的名义唤醒他们罪恶的梦”,“因为基督吩咐他们的门徒,爱他们的朋友,和爱自己一样”,^②最后饮弹身亡,以自己的牺牲警醒世人、拯救世人,完成了基督的使命。《一个女教员》中的女教员也是一个牺牲个人幸福拯救百姓和国家命运的女性基督形象。

陈衡哲笔下的人物也多具牺牲精神。《西风》中的明月为洗涤尘世的黑暗与不平而舍弃与西风的爱情来到尘世做事,“我正是因为下面的世界太恶浊了,住在那里的人们只有下降的机会,没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宁愿牺牲了红枫谷里的快乐,常常下去看看他们,想利用我这一点的爱力,去洗涤洗涤他们的心胸,并且去陪伴

① [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243页。

② 庐隐:《余泪》,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第164页。

陪伴那比较高尚一点的人们的孤寂”。^①具有牺牲精神的明月因其女性化的角色功能充当了女性化的基督。石评梅更是奉行“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生哲学，在生活中遭遇了两次没有结果的爱情，并接连受到病痛的折磨，仍然以基督自喻：“这世界，到处都是荆棘，到处都是刀兵，到处都是喘息着生和死的呻吟，四处都洒滴着血和泪的遗痕。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旅途上为止。”^②作品集中体现了石评梅人生哲学和耶稣式牺牲精神的是那些给病弱肉体 and 迷途灵魂带来痊愈和新生的教会医生与护士。苏雪林笔下的马沙修女和白朗女士，虔洁、谦逊、克己、忍让、扶助他人，身上也笼罩着耶稣基督的神圣光环，是基督的化身或圣母马利亚的显现。

五四女性文学中普遍存在着女性基督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女作家认识耶稣的独特性。在她们看来，耶稣尽管具有生理上的男性特征，但其经历、品质却体现了一个母亲、妇女、受压迫者的性质，所以他不但是“女性的弥赛亚”，甚至本身就是一个“女基督”。

三、女性基督形象意义之一： 对父权等级制思想的抗拒

在女性主义神学家和女性解放者共同关注的基督论中，中国五四女作家所描绘的女性基督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亚洲妇女神学家认为，在多元文化与多种宗教的亚洲，在肯定妇女经验及本土文化价值之余，重新反省系统神学中许多传统视之为不可动摇

① 陈衡哲：《西风》，朱维之编：《陈衡哲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第26页。

② 石评梅：《毓情寄向黄泉》，李蓉选编：《石评梅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第83页。

的教义,是亚洲妇女神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①她们提出,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来设想耶稣或圣灵或马利亚,甚至可以用非基督教传统的意象,只要表达了妇女的真实经验。中国五四女作家从真实的妇女经验出发,描绘了独特的女性基督形象,这个形象既不同于西方传统基督教中的弥赛亚形象,也不同于中国男性作家和男性神学家所理解的耶稣形象,还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者理解的基督形象。女性基督的形象既丰富了西方女性主义神学的基督论,也拓展了第三世界、亚洲妇女神学的基督论。

传统的基督论是按照由上而下的进路依据三位一体的教义来论述耶稣基督的。在此脉络下,教会神学家强调耶稣作为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体现兼具神性和人性的特点,而忽视甚至否定历史耶稣实际在世的作为,即便提到,也多着墨于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等神学议题,很少提及他在世上的言行,尤其是他与那些受欺压的、遭边缘化的外邦人、弱势群体和妇女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女性主义神学的观点,这样的基督论非但没有传报“受压迫的得解放,被掳的得自由”的福音,也没有带来处在父权阶层最底层妇女的解放,反而成为父权制文化的同谋,加重了性别主义观念。特别是在以“父亲”这个人类中心、父权制意象为主导的模式下,所建构出来的排他的、阶层化的系统性神学论述,更易使基督论遭滥用,成为性别歧视的借口。^②萝特非常警醒地归纳了奥古斯丁表述的基督论:

唯独男性才是人类标准或普遍的种别性别;只有男性才能代表人类完全的本性,而女性在生理、道德和精神上是有缺陷的。所以上帝道成肉身进到一个男性里,不是一个历史

^① 陈文珊:《耶稣如何是基督?——试探妇女神学的基督论》,http://www.ccccn.org/article/teo/basic/2008-07-31/2089.html。

^② 同上。

的偶然，而是一个本体论的需要。就如基督在一个男性身体上道成肉身，故此只有男性才能代表基督。^①

这就形成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基督论，在这种论调下，耶稣的男性身份被强化，被理论建构成真正的人性，与此相对应，女性则成为第二性，是次级的性别或物种。尤为重要的是，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的男性隐喻和男性意象，以及具有排他性的男性诠释与言说的霸权。

面对关于耶稣基督的男性中心主义论述，女性主义学者纷纷做出回应和反击。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如玛丽·达利质疑一个男性的救主能拯救妇女，坚持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不能同时是个基督徒。而一些不愿意放弃基督信仰的女性主义神学家则从自己的经验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既能实现自己的性别认同又能容纳耶稣的男性身份的新的基督论。根据陈文珊在《耶稣如何是基督？——试探妇女神学的基督论》中的论述，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建构的基督论大致有如下几种：阴阳同体的基督论、灵性的基督论、人类解放的基督论、象征的基督论、比喻的基督论、亚洲处境的基督论等。^②中国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

① 萝特：《性别主义与言说上帝》，第141页。

② 阴阳同体的基督论主张，亚当原来兼具男女二性，亚当的男性与女性分离，标志了人性的堕落，以及性别与罪恶的临到，而耶稣基督则是阴阳同体的新亚当，拯救世人脱离性别的分离。灵性的基督论则视基督是先知的灵，虽不否认历史耶稣与基督的独特关联性，但是主张基督并未在历史耶稣的身上完全体现，而体现在男女信徒之中。人类解放的基督论的代表人物是萝特，她认为耶稣的性别身份不重要，关键是对其代表全人类的解放。象征的基督论由天主教女性神学家伊丽莎白·琼森提出，她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神学象征，在性别象征论诠释下，耶稣是男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太多的男人不像耶稣。比喻的基督论认为，理解作为比喻的耶稣，关键在于理解他的存在方式，即他与上帝及他人的关系，而不是他的男性身份。亚洲处境的基督论以韩国神学家郑景妍(Chung Hyun Kyung)等为代表。陈文珊：《耶稣如何是基督？——试探妇女神学的基督论》，<http://www.cccn.org/article/teo/basic/2008-07-31/2089.html>。

形象应该是对上述女性主义基督论的有力补充,而且是所有关于基督的女性主义论述中抗拒父权等级制度最突出者之一。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女性救主形象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封建的父权等级思想。几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封建社会通过一系列清规戒律(如“三从四德”)从思想上将妇女排除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之外,又通过一些身体束缚(如缠足等)从生理上将妇女控制在家庭生活之内,从而造成中国妇女对男性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依附性。而对于中国女性长期以来具有的依附性特点,作为始作俑者的中国男性不但不反思自身,反而越发歧视女性,甚至加罪女性。即使近代的开明人士,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父权主义思想,认为中国羸弱不堪的原因全在中国妇女,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然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①五四女作家通过女性的救世主形象向中国父权主义宣告:中国女性无时无刻不在牺牲自己以换取他人的幸福与解放,以无私的爱和博大的胸怀推动人类的生生不息,她们不但没有无所作为,反而是社会的创造者、推动者、拯救者。因此,女性基督无疑是对中国父权思想的巨大反讽。

四、女性基督形象意义之二： 对女性传统价值的肯定

五四女作家之所以将耶稣描绘成女性,从表层看源于耶稣基督的一些特性和女性的经历相似的事实:本质上的受害者,永远的受难,为着罪和整个世界作无辜的献祭和牺牲。西蒙·波伏娃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载《饮冰室文集》(1),参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第549—546页。

在《第二性》中探究了妇女对耶稣血带关系的认识，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女人每月一次经血、生孩子时也要流血，女人因而将自己看作男人献祭的受害者：

他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流着血的身体：她以超乎一切的热情，沉浸在对这个被钉十字架上的圣者的冥想之中……她在上帝的羞辱中惊奇地发现了对人的废黜；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是惰性的、被动的、遍体鳞伤的，他有一种苍白的、有血痕的、暴露在野兽、匕首、男性面前的受难者的翻转过来的形象，小女孩常常被迫认同于这一形象；她十分感动地看到，这个人，是人的上帝，扮演了她的角色。她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她被许诺会有耶稣复活的光辉。^①

生理上相似的痛苦经历至少使女性在面对耶稣时产生了熟悉的感觉，丰富了女性认识耶稣的感性经验。对中国女作家而言，耶稣和她们似曾相识，除了这生理上的痛苦经历外，重要的在于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无休止的劳作、付出、牺牲，还要被虐待、受歧视、遭凌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女人来到世上似乎就是为了受苦。同样，耶稣来到世上也是为了受苦，他同样地劳作、付出、牺牲、被虐待、受歧视、遭凌辱。如前所述，五四女作家在耶稣身上更多地见证了中国母亲和女性受苦受难的历程，并从耶稣受难的意义——通过自己受难换取人类的完满人性——中看到了自我的价值，获得前进的动力。所以，与西方女作家不同，中国五四女作家将基督描绘成女性，更多地是藉此肯定女性具有的传统价值，而西方女作家将基督描绘成女性时，则更多地具有内在的反

①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765页。

讽意识。^①就反讽意义而言,中国女作家恰恰在用女性基督形象讽刺中国父权社会对女性存在价值的抹煞。

有意思的是,处在五四这样一个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反传统时代,作为走出家庭接受学校教育的中国第一代女性,五四女作家并不像西方女性主义者表现得那样叛逆、决绝和激进,仍然肯定和保守着被激进主义者认为不合时宜的传统价值。被学者毅真称为闺秀派的冰心、苏雪林、新闺秀派的凌叔华以及五四运动早期的陈衡哲,都基本肯定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及价值。即使否定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的新女性派作家庐隐、冯沅君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石评梅,也同样强调女性牺牲、谦逊、博爱的品质。她们大都将女性放在“牺牲”的位置上,主张用女性或母性的爱化解人世间的矛盾。她们礼赞爱和牺牲,认为它是女人的天性,“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动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所以,耶稣受苦的仆人意象之所以能对中国女作家有意义,在于广大的中国妇女与耶稣具有相似的受苦顺从经历,从而能够在自己的人性 with 耶稣的人性之间建立意义的关联,并藉此看到了自己痛苦的意义。

但是,女性的这些品质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一方面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还会在不经意间强化而非颠覆性别主义的刻板印

① 大部分西方女作家认为,女性基督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男性强加给女性的牺牲、受难品质,从而削弱了女性的自我,所以她们不大认可女性基督形象,反而运用女性基督形象达到反讽目的。因此在西方当代女作家笔下出现的女性基督多玩世不恭、犯罪、拒绝受难。关于西方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的研究,可参见 Barbara Hill Rigney, *Lilith's Daughters: Women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11-35。

② 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卓如编:《冰心全集》(3),第306-307页。

象。她们由此认为,女性基督的意象并不能批判地理解与诠释女性自己的实况处境以及圣经中的耶稣故事,反倒延续了性别的意义框架,并成为要求妇女一味忍让、怯于反抗、甘心顺从父权宰制的鸦片。^①然而,中国五四女作家却认识到自我牺牲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联系,将自我牺牲看作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因此平静而愉悦地肯定了女性自我牺牲的价值,并将这些自我牺牲的女性提升到基督耶稣的位置。需要强调的是,五四女作家并没有宣扬女性屈服于男性、怯于反抗父权的思想,目的在于充分肯定女性的价值与品德。

欲准确把握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形象及其体现的价值,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确认女性基督形象所体现的女性传统价值。五四女作家所礼赞的女性价值是此价值——克己牺牲、谦逊忍让、博爱宽恕之美好品质,这些品质不应随时代变化而消失;而非彼价值——三从四德、虚荣享乐、刁钻刻薄之恶劣习俗,那些习俗必将随社会进化而摒弃。在封建父权社会下,此价值和彼价值同时并存,此价值不是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得以生存的权宜之策,乃是女性及全人类的善良本性;彼价值则是女性面对父权制压制而不得动弹时的自我沉溺,也是女性及全人类应摒弃的劣根性。在新时代妇女解放的目的就是要继承与释放此价值,舍弃与鞭笞彼价值。中国女性的解放进路正是在此原则下进行的。在中国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下,对中国妇女而言,妇女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同等重要,女性身份和后殖民身份需要同时考虑。所以,女性的基督精神无论对风雨飘摇中的国家还是对迷茫徘徊中的女性个体,都具有特定意义。

其次,要厘清女性意识这个概念。根据乔以钢的定义,“所谓

^① 陈文珊:《耶稣如何是基督?——试探妇女神学的基督论》,http://www.ccccn.org/article/teo/basic/2008-07-31/2089.html。

女性意识,在其表现上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①而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女性基督形象都体现了女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女性的眼光和立场审视耶稣基督,进而确定女性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父权等级社会中,中国妇女过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它者(the other)生活,不但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还丧失了作为“女人”的女性意识。她们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利,也没有表达自己经验的权利,是无言、无声的客体。五四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的姿态、主体的形式言说自己的故事以及自己的经验,她们创造的女性基督形象就是最好的明证。

第三,还应注意,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不仅为他者生存而牺牲个体利益,还为民族、国家的复兴而奉献自己的生命,甚至为全人类的救赎而担当罪恶与献祭,具有更广阔的现实意义。前者如冰心《我的学生》中的S,继者如庐隐《一个女教员》中的女教员,后者如庐隐《余泪》中的白教师。这些形象表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超越了拯救个体的狭隘范围,而指向国家、民族进而全人类的广阔视野,由探讨个体价值进而思索人类的终极意义。正如王本朝所概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以‘十字架’和耶稣意象表现的不是宗教的意义,而是现实的自我体验和民族境遇,用它来象征忍受苦难、担当责任和献身社会的自我身份和理想,或是讽刺现实里的背叛者和伪善者”。^②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基督形象。

① 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158页。

②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325页。

最后，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女性和耶稣之间的相互关联不但没有延续性别的传统意义框架，也没有成为要求妇女一味忍让、怯于反抗、甘心顺从父权宰制的鸦片，反而增加了女性的自信。耶稣的神性因素——通过自己的受难而成就全人类的完满人性——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不但肯定了女性的价值，还为女性勾画了美好的未来图景。最终，五四女作家谱写了这样一条与耶稣相遇的道路：从认可耶稣到接受耶稣再到接受女性基督（或女性就是基督），实质上就是从“上帝和我们在一起（God-with-us）”到“上帝在我们中间（God-among-us）”，最后到“上帝就是我们（God-is-us）”。^①在这条道路上，五四女作家认识到，拯救人类的是女性，拯救女性的还是女性。庐隐在《“女人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

为甚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妇女本身所受的苦痛，为甚么妇女本身反不觉得呢？妇女也有头脑，也有四肢五官，为甚么没有感觉？样样事情都要男人主使提携。这真不可思议了！

妇女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妇女解放的事实，大半都是失败……这是因为妇女本身没有觉悟，所以经不起磨难，终至于失败。

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决。^②

小 结

中国五四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了自己对耶稣形象的认

① Chung Hyun Kyung, *Struggle to Be the Sun Again: Introducing Asian Women's Theology*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0), 61.

② 庐隐：《“女人成美会”希望于妇女》，钱虹编：《庐隐选集》（上），第3页。

识,丰富了基督学的内容。总的看,五四女作家从两个层面接受和表现基督教的耶稣形象,从而使耶稣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从儒家传统文化出发,她们祛除耶稣身上的神性,并用中国圣贤比附耶稣,将耶稣看成一个圣人,尊崇耶稣伟大的人格——“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另一方面从女性经验出发,认同耶稣的经历就是中国女性的经历,耶稣不但是中国女性的知心朋友,而且能坚定中国女性生活的信心,由此女作家更愿意再现生活中的女性基督。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以耶稣的男女平等思想和女性基督形象对抗父权等级观念,并最大限度地肯定女性的价值。从这两个方面看,五四女作家心目中的救主无论是耶稣还是基督,无论是降至肉身还是上升为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无关紧要,底线是不再压制中国女人,并能体现中国妇女的价值。

作者郭晓霞,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西女性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近期论文有《上帝的性别——以苏雪林、冰心为例简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冰心的母爱与其母性上帝观》等。